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sup>\*</sup>

曾向红 王昊语

【内容提要】在面临多重风险的情况下，土耳其为何仍强势介入第二次纳卡冲突？作者尝试运用“机会窗口”的理论框架予以解释，认为土耳其之所以强势介入纳卡冲突，离不开对“机会窗口”的认知与把握。“机会窗口”涉及危机事件的出现、国际形势变化与国内政治动员三个方面的因素。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境冲突这一危机事件，是促使土耳其在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后启动相关行动的“催化剂”。土耳其考虑的国际因素包括南高加索地区大国博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实力对比的影响；土耳其国内也出现了推动介入的“机会窗口”，包括政治制度变迁与精英联盟变化、主流文化思潮的变化、与冲突国家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它们合力推动土政府启动内部政治动员，从而赋予土耳其干预纳卡冲突以合法性，进而有利于土政府把握住干预的机会。通过对土耳其在纳卡冲突前后伺“机”而动的过程进行梳理，不仅能对其“鲁莽”的干预行动予以合理解释，而且可更深入地理解土耳其政府近年来实施的“进取性”外交政策。

【关键词】土耳其；第二次纳卡冲突；机会窗口；政治机会结构；地区安全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昊语，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兰州 邮编：730000）。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23.02.003

【中图分类号】D815；D8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23）02-0049-32

---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1VGQ010）的阶段性成果，且得到2022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大国中亚政策调整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批准号：2022jbkyjd001）及定向探索项目“俄罗斯—土耳其关系与欧亚地区安全秩序（2011—2021）”（项目批准号：22lzbkyxs009）的资助。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 一 问题的提出

南高加索地区对于土耳其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其连通土耳其与中亚里海能源区，是土耳其实现能源自主和占据能源枢纽地位的关键。同时南高加索地区也是连接“突厥语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的重要通道，是实现突厥语国家联合的关键组成部分。<sup>①</sup> 苏联解体后该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土耳其在泛突厥主义思想影响下，试图利用地缘毗邻和历史文化联系紧密等优势提升其影响力，但受制于自身国力和俄罗斯在 1993 年推行的“近邻”政策，未能实现预期目标。<sup>②</sup>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土耳其虽依然强调南高加索地区的重要作用，但与该地区的关系更多停留在经贸能源往来的层面，高政治领域交流较为有限。<sup>③</sup> 2011 年是土耳其外交政策整体转向的一年，也是其南高加索政策改变的分界点，表现在其明显加强了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军事合作，开启了南高加索“积极创建”外交政策时期。<sup>④</sup>

2020 年 9 月纳卡冲突爆发，<sup>⑤</sup> 土耳其高调参与、深度介入，成为其南高加索政策愈发激进和冒险的缩影。<sup>⑥</sup> 此举可能使土耳其陷于多重风险之中，显得十分“鲁莽”。首先，介入纳卡冲突会影响其国内经济发展，因为对阿塞拜疆的支持会大幅度提高土

---

① *Special Edition of World of Diplomacy Journal of the MFA of Azerbaijan, 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 2020, <https://www.turkicstates.org/assets/pdf/yayinlar/azerbaycan-cumhuriyeti-disisleri-bakanliginin-yayini-diplomasi-dunyasi-dergisi-turk-konseyi-ozel-sayisi-12-en.pdf>.

② Ziya Onis, “Turkey and Post-Soviet States: Potential and Limits of Regional Power Influence,”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 No. 2, 2001, pp. 66-71.

③ H. Burç Aka, “Paradigm Chang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Post-Cold War,”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3, 2014, p. 67; Gaber Evgenia, “Turke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The Post-Soviet Period,”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Vol. 12, No. 3, 2011, pp. 144-147.

④ 曹鹏鹏：《土耳其安全观及冷战后对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政策》，《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20 年第 3 期，第 61 页。

⑤ 下文若无特殊强调，“纳卡冲突”均指 2020 年 9 月发生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第二次纳卡冲突。

⑥ 康杰：《新一轮纳卡冲突：回顾与评估》，《人民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简报》2020 年第 3 期，<http://sis.ruc.edu.cn/upload/editor/1/1603185862522.pdf>；Cory Welt and Andrew S. Bowen, “Azerbaijan and Armenia: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January 7, 2021, <https://sgp.fas.org/crs/row/R46651.pdf>.

土耳其的军费开支,使本就疲软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背上更为沉重的负担。<sup>①</sup>其次,俄土关系复杂,南高加索地区属于传统的“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将这一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亚美尼亚是集体安全组织成员,属于俄罗斯的军事盟友,国内还有俄罗斯的军事基地。<sup>②</sup>对亚美尼亚的进攻可能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进而引起其军事干预。俄罗斯曾明确警告土耳其,若其介入纳卡冲突则将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甚至会引起对土耳其本土的核打击。<sup>③</sup>再次,美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在南高加索地区也存在切身利益,美法两国都是第一次纳卡冲突后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的共同主席国,在纳卡问题上具有较大影响力。加之美法都有大量亚美尼亚裔选民,可以对其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故贸然支持阿塞拜疆也将面临美法两国的不满甚至制裁。<sup>④</sup>最后,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以军事手段夺取纳卡地区,本身也对国际法构成挑战,可能会使土耳其国际声誉下降,本就四面树敌的土耳其在外交上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是何原因促使土耳其在面临多重风险的情况下仍强势介入纳卡冲突?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可以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更具有整合性的解释框架,为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提供更全面、合理的解释。同时,选取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这一事件为案例,更有助于理解其近年来的“进取性”外交政策。其一,该案例具有代表性。南高加索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油气资源丰富,同时也是亚洲油气运往欧洲的能源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纳卡地区是南高加索的“火药桶”,地区争端由来已久,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大国利益相互交织,对于南高加索的地区秩序走向意义重大,是域内国家、周边大国与全球性大国重要的战略博弈地区之一。通过对土耳其介入此地区冲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包括其介入中东、东地中海等周边地区在内的整体战略。其二,该案例具有时效性。纳卡冲突发生于2020年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世界秩序转型等整体背景延续至今。而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正是其“进取性”外交政策的最新反映之一。

---

①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Understanding Oscillation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athways to Unusual Middle Power Activ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12, 2021.

② 曹鹏鹏:《土耳其对外高加索地区的政策及其困难》,《战略决策研究》2020年第5期,第75页。

③ 孙德刚、邓海鹏:《美国在土耳其军事基地的部署与前景》,《美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141页。

④ Kamer Kasim,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and Implications for Its Resolution,”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2, No. 2, 2012; Tigran Yegavian, “French-Armenian Relations: Past and Present,” EVN Report, November 30, 2021, <https://evnreport.com/politics/french-armenian-relations-past-and-present/>.

### 二 既有研究成果述评

目前，对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动因的分析主要分为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将土耳其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其政策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坚持这一视角的有穆罕默德·罗伊斯·阿德斯基亚（Muhammad Rois Adzkie）等学者。他们借鉴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国家利益概念，提出“国家利益论”，将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的原因归结为不同形式的国家利益，从紧迫性、持续时间、规格（Specifications）、兼容性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共同的宗教身份、良好的国家关系、丰厚的军售收入、提升地区影响力、缓和与俄罗斯关系等利益驱使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sup>①</sup>

其他学者虽未给出明确的理论框架，但同样将土耳其视为单一行为体，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土耳其对纳卡冲突的介入。归纳起来他们的论述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影响论”。这一观点认为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有利于提升国际影响力。首先，通过全力支持阿塞拜疆，帮助其在战争中获胜，从而削弱亚美尼亚的地区影响力，提升阿塞拜疆作为土影响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支点作用。其次，分散俄罗斯在中东、地中海等地区的注意力，以策应土耳其在其他方向的“扩张”。最后，通过支持“突厥”国家阿塞拜疆收复失地，巩固土在突厥语国家组织中的主导地位。<sup>②</sup>二是“能源安全论”。这一观点认为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是出于维护其能源安全的目的。从2020年起阿塞拜疆已成为土耳其最大的能源输入国，如果阿塞拜疆的局势不稳定，就会危及土耳其的能源安全。2020年7月，在塔乌兹地区（Tovuz rayonu）爆发的阿亚冲突临近能源管线，这进一步引起了土耳其的警觉，对于本国能源安全的考虑促使其介入纳卡冲突。<sup>③</sup>三是“身份政治论”。这一观点强调国家身份使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土阿两国同属“突厥”语族，有着良好的历史关系，被称为“一

<sup>①</sup> Muhammad Rois Adzkie and Sugeng Riyanto, “Turkey’s Engagement in the Conflict of Nagorno-Karabakh,” *Jurnal Studi Diplomasi Dan Keamanan*, Vol. 13, No. 2, 2021.

<sup>②</sup> 邓浩：《纳卡问题的“解冻”与“破解”》，《世界知识》2020年第22期，第23页；Daria Isachenko, “Turkey-Russia Partnership in the War over Nagorno-Karabakh: Militarised Peacebuilding with 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SWP Comment, No. 53, November 2020, p. 4, [https://www.ssoar.info/ssoar/bitstream/handle/document/71460/ssoar-2020-isachenko-Turkey-Russia\\_partnership\\_in\\_the\\_war.pdf](https://www.ssoar.info/ssoar/bitstream/handle/document/71460/ssoar-2020-isachenko-Turkey-Russia_partnership_in_the_war.pdf).

<sup>③</sup> Emil Avdaliani, “Turkey’s Win-Win Strategy in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 No. 1816, November 13, 2020, <https://besacenter.org/turkey-nagorno-karabakh-strategy/>；邓浩、康杰：《2020年疫情影响下的南高加索地区形势：变化和挑战》，载孙力主编：《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页。

个民族，两个国家”。相反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却存有“世仇”，双方围绕着种族屠杀、边界领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与两国关系的明显差异决定了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支持阿塞拜疆。<sup>①</sup>

第二种视角打开了国家黑箱，尝试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探求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在土美关系恶化、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等因素影响下，土耳其国内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土政府希望通过采取激进的对外政策，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sup>②</sup> 安娜·约维奇·拉泽西（Ana Jović-Lazić）引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进行解释，认为需要从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两个角度理解这一问题。在国际环境层面，“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危机冲击了土耳其当时的“与邻国零问题”政策，土耳其将此视为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开始实施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这带动了其对南高加索地区政策的转向，从而为介入纳卡冲突创造了条件。在国内政治层面，在面临较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时，埃尔多安选择利用威权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维护其统治地位，并利用对外冲突转移国内矛盾。在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的双重影响下，土耳其采取激进政策介入纳卡冲突。<sup>③</sup>

总体来看，两种视角各有其合理性，也分别对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作出了解释。不过，这些解释似乎仍各有不足。第一，将土耳其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视角强调土政策的延续性，但土耳其对于两次纳卡冲突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变化，强调国家利益延续性的理论框架无法很好地解释变化的原因。虽然“国际影响论”“能源安全论”和“身份政治论”三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利益，但无法很好地解释在面临大国压力、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法限制等重重压力下土耳其为何仍强势介入纳卡冲突，所以单一国家视角的解释力度有限。第二，打开土耳其国内黑箱的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尤其是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的

---

① M. Hakan Yavuz and Michael M. Gunter, eds.,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 289; Adilah Hasna Khairunisa,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Turkey’s Support of Azerbaijan in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March 31, 2022, <https://eudl.eu/pdf/10.4108/eai.31-3-2022.2320955>.

② M. Hakan Yavuz and Vasif Huseynov, “The Second Karabakh War: Russia vs. Turkey?”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7, No. 4, 2020, pp. 108-109;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Understanding Oscillation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athways to Unusual Middle Power Activ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12, 2021, p. 3059.

③ Ana Jović-Lazić, “The Role of Turkey in the Second Armenian-Azerbaijani Armed Conflict over Nagorno-Karabakh as a Reflection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Foreign Policy,” *Medjunarodni Problemi*, Vol. 74, No. 1, 2022.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运用很有启发意义。拉泽西的研究仍有不足，她在国际因素层面将“阿拉伯之春”后的地缘政治机会视为影响土耳其整体外交政策，进而影响土耳其南高加索政策的关键因素。她对于大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政策有所忽视，而这一因素可能更为直接地影响到土耳其对纳卡冲突的介入。国内因素方面关注到威权主义、民粹主义等的影响，这对国内政治动员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她的研究未注意到土国内主流文化思潮、土耳其与被介入国关系的变化，仅将介入纳卡冲突视为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的“权宜之计”，无法更深刻地理解国内政治动员对于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深层影响。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借鉴“机会窗口”概念，通过关注国内与国际影响因素，在体系和单元分析层次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尝试为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提供更为全面、合理的解释。

### 三 伺“机”而动——危机形势下 “机会窗口”的出现及其构成

“机会窗口”解释框架有助于理解国家对外决策转变的动因。这一解释框架认为，国家外交决策的转变是基于对“机会窗口”的认知与把握，而“机会窗口”受到危机事件爆发、国际形势变化、国内政治动员三重因素的影响。

#### （一）“机会窗口”概念的界定及其组成

“机会窗口”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武装冲突和国内公共政策的研究领域。<sup>①</sup>在武装冲突研究中，“机会窗口”的开启常被用于解释大国之间或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时机。“机会窗口”被定义为“一个国家相较于对手拥有重大军事优势的时期”<sup>②</sup>或“守成国虽实力下降但仍保有进攻机会的时期”。<sup>③</sup>在国内公共政策研究中，这一概念主要用于解释议程设置成功的机遇，将其“机会窗口”定义为“在短期内，根据给定的动议而采取行动的机会”。<sup>④</sup>这两个领域中的概念都强调对关键时机的把握，不过因受到研究领域的限制，都还不能很好地解释

<sup>①</sup> Fredrik Doeser and Joakim Eidenfalk, “The Importance of Windows of Opportunity for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4, 2013, p. 392.

<sup>②</sup> Richard Ned Lebow, “Windows of Opportunity: Do States Jump Through Th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1984, p. 147.

<sup>③</sup>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sup>④</sup> 约翰·W. 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丁煌、方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国家介入周边冲突政策的动因。近期外交决策研究领域也开始运用“机会窗口”的概念，虽然没有给出“机会窗口”的明确定义，但不妨碍给予我们以启发和借鉴。鉴于“机会窗口”是一种基于对客观形势变化的主观认知与解读，结合本文内容，我们将其定义为：决策者评估内外环境后趋利避害、抓住时机、采取果断行动的关键时间节点。

在此定义下，“机会窗口”的构成需要同时关注内部与外部的影响因素。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认为，国际冲突领域中的“机会窗口”可分为“内部窗口”和“外部窗口”。其中“内部窗口”源于国内的变化，如长期的经济增长、军备扩充或短期内的军备动员等原因都会影响“内部窗口”的开启。“外部窗口”源于外交形势的变化，如盟国数量的增减等因素会改变权力的分布，进而影响“外部窗口”的开启。<sup>①</sup> 在外交政策研究中，杰夫·切克尔（Jeff Checkel）和约根·哈克（Jürgen Haacke）等学者在探讨“机会窗口”的构成时，也都基本沿用了埃弗拉关于内外窗口的划分。<sup>②</sup> 但现有研究对于“机会窗口”内、外部影响因素的界定并不全面，内部过于注重经济、军事实力等客观因素，而忽视了内部观念与合法性的问题；外部则对于外交形势的变化缺乏更精细的判断标准。后文将引入“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和“地缘政治机会”的概念，以对“机会窗口”影响因素的界定加以完善。

“机会窗口”开启有两个判断标准：外部权力分布与内部合法性。外部条件适宜是在满足基本国际规范的前提下，着重于对实力对比的考量。当域外大国势力减弱且域内国家实力对比有利时，可认为外部条件适宜。这构成了“机会窗口”的外部组成部分。国内方面，短期内土耳其内部条件并未发生急剧变化，其经济、军事实力也远超被介入国。所以起到更大影响作用的是国内合法性问题，在何种情况下国内更加支持深度介入纳卡冲突是判断内部环境是否适宜的关键因素。这构成了“机会窗口”的内部组成部分。当“机会窗口”的外部组成部分（国际形势有利）和内部组成部分（国内政治动员充分）均满足后，往往还需要“危机事件”作为

<sup>①</sup>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1页。

<sup>②</sup> Jürgen Haacke, “Foreign Policy Entrepreneurs, Policy Windows and ‘Pragmatic Engagement’: Reconsidering Insights of the 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2009 Policy Shift Toward Military-Run Myanma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7, No. 3, 2021, p. 7; Jeff Checkel, “Ideas, Institutions and the Gorbachev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2, 1993, p. 279.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催化剂”，将各种因素相连接，最终开启对外决策转变的“机会窗口”。

### （二）“机会窗口”出现的“催化剂”——危机事件

危机事件的出现是促使内、外部因素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会对外交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行为体重要的外交决策都需要一个将合法性与能力相结合的机遇。在社会层面，危机事件会推动国内政治动员。当事件的发生与个人认知相符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感，并在情绪与行动相互传导下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sup>①</sup>这也进一步影响到外交决策。有学者提出，当某一事件有着重大变化或极强紧迫性的时候更容易引起决策者的关注。<sup>②</sup>通过“安全化”的方式，危机事件的出现更容易引起国内政治的关注，进而引发国内议程调整。危机事件为“机会窗口”的出现营造舆论氛围，提高利用“机会窗口”进行外交决策的合法性。<sup>③</sup>“机会窗口”还具有打开程度的区别，相比之下，因国家间的战争、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等因素而开放的“机会窗口”规模更大，更有助于大幅减少政治和体制上的阻力，进而增强政府的行政权力，使政府有机会选择更加激进的政策。<sup>④</sup>

### （三）“机会窗口”构成的外部因素——国际形势变化

国际形势变化强调国家对于外部客观要素“理性”地分析与权衡，主要目的是评估其改变现状的能力。国际形势变化也被部分学者定义为“地缘政治机会”，即当国家间实力对比失衡或体系结构因地缘政治格局调整而产生变化时，希望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体系中存在积极行动的窗口预期。<sup>⑤</sup>这一窗口的确定要考察域外大国介入地区的意愿与行动，以及域内国家实力对比情况。

地缘政治环境。地缘政治环境影响“机会窗口”的出现，决策者需要审慎地评估当前的政治安全挑战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地缘政治与大国关系密切相关，域外大国或霸权国的影响力可以超越海陆边界，对目标区域产生重要影响。<sup>⑥</sup>其战

<sup>①</sup> 向良云：《导火索事件的社会认知策略与过程——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微观视角》，《情报杂志》2011年第6期，第47页。

<sup>②</sup> 约翰·W. 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丁煌、方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sup>③</sup> John T. S. Keeler, “Opening the Window for Reform: Mandates, Crises and Extraordinary Policy-Mak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5, No. 4, 1993.

<sup>④</sup> Andrew P. Cortell and Susan Peterson, “Altered States: Explaining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No. 1, 1999, pp. 185-186.

<sup>⑤</sup> 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62页。

<sup>⑥</sup>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略目标、国家实力、国家利益等因素都成为地缘政治环境的重要参考。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环境还要考虑域内被介入国的情况以及域内被介入国与域外大国的联系程度。在未触及大国核心利益时，域外大国对地区形势改变的容忍度较高，介入冲突的“机会窗口”更容易开启。在地区层面，当面临全球性大国和霸权国介入时，地区力量对比可能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而当域外大国对于地区关注度下降时，地区内部实力对比则会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sup>①</sup>

域内国家实力对比。经济发展相对速度的快慢、军备增长水平的高低、联盟关系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导致两国的相对实力发生变化，而相对实力的变化会打开“机会窗口”。<sup>②</sup> 在分析安全问题时既需要关注体系层面大国的互动，也需要关注地区内部安全彼此关联的群体。各国的安全状况和全球大国干涉的进程只有通过理解地区安全态势才能加以把握。<sup>③</sup> 所以介入冲突也需要考虑冲突区域内双方实力的对比，在所支持一方实力明显占优的情况下，国家介入冲突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也成为介入冲突“机会窗口”的重要影响因素。

#### （四）“机会窗口”构成的内部因素——国内政治动员

国内政治动员强调国家外交决策需要社会的支持。国家在执行外交政策的资源汲取过程中，时常会面临社会的制约。由于不对称信息、对于未来威胁的忽视以及缺乏集体行动的动力这三点原因，国家的安全战略实施可能会受到限制。<sup>④</sup> 这一困境实质上是由于公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不够和支持意愿不足所导致的，而提升公众的意愿需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增强政策的合法性，这也是“机会窗口”构成的内部因素。借鉴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的“政治机会结构”相关概念，本文探讨影响土耳其政府进行国内政治动员的因素。<sup>⑤</sup>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政治机会结构”常

① 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0页。

②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③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④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⑤ “政治机会结构”广泛应用于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可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205页；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172页；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被用于解释各种有利于社会运动出现或持续的结构因素。<sup>①</sup> 在结合土耳其国内现实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政治制度变迁与精英联盟的变化、主流文化思潮的变化、与冲突国家关系的变化这三个影响国内政治动员的因素。

国内政治动员需要关注政治制度变迁与精英联盟的变化。通过对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等学者关于“政治机会结构”构成要素研究的回顾，发现他们都首先观察到“正式的法律制度结构”。<sup>②</sup> 正式的法律制度变迁影响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制度化”有助于将部分人的观念转变为影响更多人的社会实在。<sup>③</sup> 本文将重点关注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政体变迁。政体变迁反映了国家权力集中程度的变化，也意味着总统在外交决策中更加独立且更具影响力。<sup>④</sup> 关于“政治机会结构”构成要素，学者强调的第二个部分就是“非正式结构”，尤其强调精英联盟存在与否。<sup>⑤</sup> 政体变迁背后政治力量的博弈也需要引起关注，其涉及精英联盟的分化与重组，在此过程中的政治交易和妥协也会影响到国内政治动员的议题和内容。

国内政治动员也需要关注主流文化思潮的变化。有学者对“政治机会结构”概念提出批评，认为这一理论缺乏对于观念文化和动员的话语内容等因素的关注，进而无法更全面地理解社会运动爆发的原因。基于此，他们提出“话语机会结构”(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概念，认为集体行动的框架如果能与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思潮相契合，将更有助于社会运动的成功。因此，应将更广义的文化因素

---

① 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79页。

② Doug McAdam, "Political Opportunity: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6-27; 张晓杰、耿国阶、孙萍：《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述评》，《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46-47页。

③ 玛莎·芬尼莫尔：《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变化》，袁正清、李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6页。

④ 总统制具有多种形式，总统制是否增强了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需要具体讨论。现有研究表明土耳其的总统制具有较大立法性权力和非立法性权力，且缺乏制衡机制，与俄罗斯超级总统制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参见徐国冲、霍龙霞：《比较视野下的土耳其总统制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⑤ Doug McAdam, "Political Opportunity: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6-27; 张晓杰、耿国阶、孙萍：《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述评》，《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46-47页。

纳入政治机会结构框架之中。<sup>①</sup> 集体行动框架与主流文化思潮之间的关联同样适用于国内政治动员。社会凝聚力与精英共识受到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二者都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凝聚力关系到国家资源的汲取能力，而精英共识关系到对于威胁的认知与所采取的应对策略。<sup>②</sup> 总之，当外交决策符合主流文化思潮时，国内政治动员会更加成功；反之，则会遭遇民众与精英的反对，使动员举步维艰，降低决策的合法性。

国内政治动员还需要关注民众对于冲突国家关系认知的变化。与影响“机会窗口”的国际形势所强调的客观国际因素不同，国内政治动员中的“与冲突国家关系的变化”更强调对于国家间关系的主观感知，其主要目的是增强对外政策的国内合法性。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不同的“共有知识”建构出行为体不同的身份与利益。在“康德式的无政府状态”下彼此认知为朋友，遵循的是互助与非暴力的原则；而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下彼此认知为敌人，可以相互摧毁，并侵害对方的主权。<sup>③</sup> 国家间关系认知存在“路径依赖”，从而能保持相对稳定性。与冲突国家关系的变化跟主流文化思潮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二者相契合，更可能引发共鸣，助推国内政治动员的成功。但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关系转变存在“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关键节点作出的抉择排除了其他选择，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效应，一定程度上决定事态的发展与走向。<sup>④</sup>

在初步阐释“机会窗口”概念及构成后，还有三点需要补充说明。第一，本文“机会窗口”的内部构成（国内政治动员）与外部构成（国际形势变化）是以内部合法性与外部权力分布为划分标准的，目的是使分析框架更加清晰，但二者所产生的影响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参见图1）。第二，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以长时段因素为主，它们对于短时期内开启的“机会窗口”有两点影响。其一是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是复杂和渐进的。决策合法性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大国介入纳卡冲突

<sup>①</sup> Koopmans Ruud and Paul Statham, “Ethnic and Civic Conceptions of Nationhood and the Differential Succes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Germany and Italy,” in Marco 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eds.,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p. 225-253.

<sup>②</sup> 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sup>③</sup>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sup>④</sup> Giovanni Capoccia and R. Daniel Keleme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59, No. 3, 2007, pp. 341-342.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的意愿与能力的变化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只有具备这些“必要条件”，土耳其才有可能介入纳卡冲突。其二是长、短时段因素的结合对于“机会窗口”的开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诸多长时段条件满足后，还需要“危机事件”作为促发内外因素的“催化剂”，进而开启“机会窗口”。第三，在危机事件、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动员影响下，介入冲突的“机会窗口”会在一定时期开启，但这是一个动态开启的过程。利用“机会窗口”时仍需谨慎行动，避免触发“窗口”关闭。例如，由于战争死亡人数上升而在国内出现“死亡人数综合征”（Body-bag Syndrome）；或者过分修正地区秩序，触及大国利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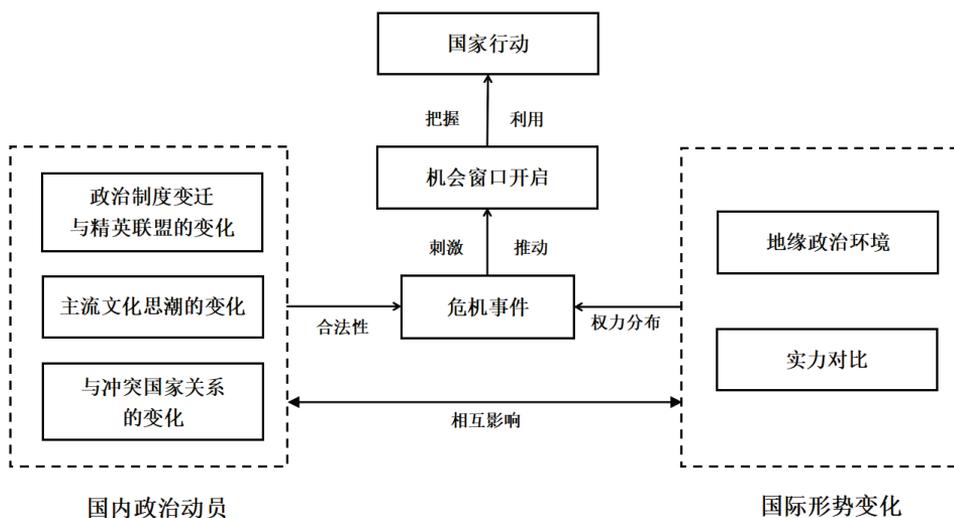


图1 “机会窗口”解释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四 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机会窗口”的“催化剂”及外部构成

南高加索地区形势变化，是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机会窗口”的外部构成。它受到南高加索地区大国博弈（俄罗斯、美国、欧盟在南高加索地区实力与介入意愿下降）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实力对比（实力对比有利于阿塞拜疆）的影响，这涉及土耳其对介入能力与客观环境的评估。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境冲突形成的危机事件则是推动土外交政策变化的“催化剂”，也是连接国内外因素的桥梁。

### （一）“机会窗口”构成的“催化剂”——危机事件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国 2020 年 7 月爆发的边境冲突既是纳卡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导致土耳其决定介入纳卡冲突的“危机事件”。冲突中阿塞拜疆一名少将阵亡，激起了阿塞拜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要求对亚美尼亚的“侵略”作出回应。<sup>①</sup> 亚美尼亚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8 月 5 日，亚美尼亚领导人公开访问卡拉巴赫，宣布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进一步激发了两国民族主义情绪。<sup>②</sup> 双方也开始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军事动员，完成战争相关准备工作。

此次边境冲突增强了土耳其介入冲突的决心，成为其介入纳卡冲突的“催化剂”。土耳其的重要能源管道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石油管道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TE）天然气管道途经阿塞拜疆，二者是维护土耳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2017 年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BTK）竣工，2018 年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ANAP）启用，阿塞拜疆在保障土耳其能源安全方面的作用更为关键。截至 2020 年，阿塞拜疆已经基本取代了俄罗斯在土耳其能源供给上的首要地位。<sup>③</sup> 2020 年 7 月的冲突并未爆发于纳卡地区，而是出现在亚美尼亚塔武什省（Tavush Province）和阿塞拜疆的塔乌兹区。而塔乌兹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这一地区拥有上述主要的能源管道。土耳其怀疑这是在为之后纳卡再次发生冲突时切断土能源管道进行预演，对此极为警觉。<sup>④</sup> 土耳其议会发表声明，反对亚美尼亚的“侵略”。<sup>⑤</sup> 土耳其外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和国防部部长胡卢西·阿卡尔（Hulusi Akar）也对亚美尼亚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警告，承诺土耳其对于阿塞拜疆的支持。<sup>⑥</sup> 受该危机事件的影响，土耳其国内开始将国际

① M. Hakan Yavuz and Michael M. Gunter, eds.,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22, p. 284.

② “Pashinyan Calls for Unification between Armenia and Karabakh,” Eurasianet, August 6, 2019, <https://eurasianet.org/pashinyan-calls-for-unification-between-armenia-and-karabakh>.

③ Saltanat Berdikееva, “Turkey’s Intervention Threatens to Expand Conflict in Nagorno-Karabakh,” Inside Arabia, October 23, 2020, <https://insidearabia.com/turkeys-intervention-threatens-to-expand-conflict-in-nagorno-karabakh/>.

④ “Turkey Vows Support for Azerbaijan in Escalating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Voice of America, September 28, 2020, [https://www.voanews.com/a/south-central-asia\\_turkey-vows-support-azerbaijan-escalating-nagorno-karabakh-conflict/6196470.html](https://www.voanews.com/a/south-central-asia_turkey-vows-support-azerbaijan-escalating-nagorno-karabakh-conflict/6196470.html).

⑤ Emin Avundukluoglu, “Turkish Lawmakers Condemn Armenian Attacks on Azerbaijan,” Anadolu Agency, July 16, 2020, <https://www.aa.com.tr/en/politics/turkish-lawmakers-condemn-armenian-attacks-on-azerbaijan/1913210>.

⑥ Gönül Tol and Dimitar Bechev, “Are Turkey and Russia Bracing for Conflict in the South Caucasus?” Middle East Institute, July 29, 2020,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are-turkey-and-russia-bracing-conflict-south-caucasus>.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形势与国内政治动员相结合，为之后更深层次介入纳卡冲突埋下伏笔。

### （二）“机会窗口”构成的外部因素——南高加索地区形势变化

#### 1. 南高加索地区的大国博弈

除土耳其外，南高加索地区还存在俄罗斯、美国与欧盟三方的博弈。在第一次纳卡冲突后，俄罗斯、美国、法国是解决纳卡问题的明斯克小组主席国。在三方之中，由于地缘因素以及南高加索地区是“后苏联空间”的历史原因，作为地区性守成国的俄罗斯，相比美国与欧盟有着更大的影响力。<sup>①</sup> 纳卡冲突“机会窗口”的外部影响因素与以上三方的利益、态度，尤其是俄罗斯的利益、态度密切相关。

俄罗斯对于纳卡冲突的进程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其发挥作用也受制于两个因素：俄罗斯自身实力的评估；其对南高加索利益尤其是俄阿、俄亚双边关系的考量。俄罗斯自身实力近年来有一定程度的下降。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国内经济受到较大影响，加上2020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与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冲击，以及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等问题，俄罗斯疲于应对，对于南高加索地区的关注度与影响力有所下降。<sup>②</sup> 俄罗斯曾就解决纳卡问题提出过多种模式，如2011年提出的“喀山模式”（Kazan Model）和2016年“四日战争”（Four-Day War）后升级版的“喀山模式”。但由于纳卡问题牵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主权、历史问题，双方都无意退让，使该问题无法按照俄罗斯的意愿和平解决。<sup>③</sup>

除此之外，俄罗斯还有地区双边利益的考虑。俄罗斯在亚美尼亚设有军事基地，双方签有军事同盟条约，亚美尼亚也是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在经济、能源等方面对于俄罗斯有较强的依赖性。俄罗斯也力图拉近与阿塞拜疆的关系，尝试在南高加索地区推行平衡政策。<sup>④</sup> 在军售方面，俄罗斯是阿塞拜疆重要的军火供应商，2009—2013年，阿塞拜疆80%的武器来源于俄，2015—2019年，有31%的武器来源于俄。<sup>⑤</sup> 在政治问题上，近年来俄罗斯与阿塞拜疆合作日益

---

① 曾向红：《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25-26页。

② 邓浩：《纳卡问题的“解冻”与“破解”》，《世界知识》2020年第22期，第23页。

③ Kavus Abushov,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Prudent Geopolitics, Incapacity or Identit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5, No. 1, 2019, p. 9.

④ Gönül Tol and Dimitar Bechev, “Are Turkey and Russia Bracing for Conflict in the South Caucasus?” Middle East Institute, July 29, 2020,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are-turkey-and-russia-bracing-conflict-south-caucasus>.

⑤ Hovhannes Nazaretyan, “Arms Supplies to Armenia and Azerbaijan,” EVN, February 17, 2021, <https://evnreport.com/spotlight-karabakh/arms-supplies-to-armenia-and-azerbaijan/>.

密切，在西方指责阿塞拜疆民主、人权问题时，俄罗斯给予了阿政府极大的支持。<sup>①</sup>在能源问题上，俄罗斯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阿塞拜疆开展合作，加大对阿能源的采购，增强两国的能源合作。<sup>②</sup>由于采取平衡政策，俄罗斯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的表态非常谨慎，对于纳卡冲突的干涉颇为慎重。

2018 年亚美尼亚“天鹅绒革命”后的政策也引起俄罗斯的不满，俄希望以某种形式提醒亚美尼亚政府政策的“错误”。尼科尔·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是“颜色革命”后上台的亚美尼亚领导人，其上台后的改革触动了俄罗斯的利益。他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亚美尼亚分公司和俄属亚美尼亚铁路公司启动了逃税调查；<sup>③</sup>还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Robert Kocharyan）和集安组织秘书长尤里·恰恰图罗夫（Yuri Khachaturov）开启刑事调查。这些行动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sup>④</sup>在外交政策上，亚美尼亚开始与西方接近，纵容国内排俄情绪发展，并尝试进行“平衡外交”，这些政策都引起了俄罗斯的警惕。<sup>⑤</sup>纳卡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宣布集安组织同盟条约仅限于亚美尼亚本土，纳卡地区冲突并不适用该组织开展维和行动，以此警示亚美尼亚不可能离开俄罗斯，平衡外交不可行。<sup>⑥</sup>同时，俄罗斯寄希望于有限战争的失利可以动摇帕希尼扬政府的执政基础，从而推动亲俄的新政府上台。<sup>⑦</sup>尽管如此，作为纳卡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俄罗斯仍希望控制冲突规模，避免使亚美尼亚遭受毁灭性打击，在平衡各方利益的情况下，使俄罗斯继续保持南高加索地区独一无二的控制力。

① 邓浩：《外高加索地区形势演变及其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73 页。

② 毕洪业：《俄罗斯对阿塞拜疆外交的困境与前景》，《俄罗斯学刊》2014 年第 2 期，第 46-49 页。

③ David Batashvili, “Nikol Pashinyan’s Russian Problem,” Georgian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https://gfsis.org.ge/publications/view/2684>.

④ İsrail Aliyev, “The Effect of Karabağ Problem on Relationship Turkey and Russia,” *Afro Eurasian Studies*, Vol. 9, No. 2, 2022, p. 122.

⑤ Daria Isachenko, “Turkey-Russia Partnership in the War over Nagorno-Karabakh: Militarised Peacebuilding with 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SWP Comment, No. 53, November 2020, p. 4, [https://www.ssoar.info/ssoar/bitstream/handle/document/71460/ssoar-2020-isachenko-Turkey-Russia\\_partnership\\_in\\_the\\_war.pdf](https://www.ssoar.info/ssoar/bitstream/handle/document/71460/ssoar-2020-isachenko-Turkey-Russia_partnership_in_the_war.pdf).

⑥ Rabia Iclal Turan, “Russia Says Defense Pact Does Not Apply to Karabakh,” Anadolu Agency, October 10, 2020, <https://www.aa.com.tr/en/europe/russia-says-defense-pact-does-not-apply-to-karabakh/1999169>.

⑦ M. Hakan Yavuz and Michael M. Gunter, eds.,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 248.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美国是对南高加索地区形势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域外行为体。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由于能源和反恐而关注南高加索地区。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开始进入“后苏联空间”，推动该地区民主化与北约东扩，企图将南高加索打造成反对俄罗斯的同盟，所以这一时期，美国开始对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采取平衡外交。从2001年起，美国以“赦免”的方式逐步放松对于阿塞拜疆的制裁，并提供排雷、提升军事能力等方面的援助，以改善与阿塞拜疆的关系。<sup>①</sup>奥巴马时期，美国寻求与欧盟一道推动南高加索地区“善治”，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sup>②</sup>美国还推动土亚两国和解以缓和纳卡地区局势，但未成功。

在推动土亚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失败后，美国决定调整南高加索政策，由之前的“参与政策”转变为“脱身政策”，<sup>③</sup>解决纳卡冲突在美国外交议程中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特朗普时期强调“美国优先”与“战略收缩”，将主要目标转向大国竞争，南高加索地区在美国政策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这种变化在美国外交代表的任命上也有所体现。2017年，美国任命了“明斯克进程”新代表安德鲁·舍弗（Andrew Schofer），但未授予其大使地位，使其影响力低于其他明斯克小组主席国代表。<sup>④</sup>在2020年纳卡冲突之前，美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与总统大选等重要问题而无暇他顾，对于纳卡冲突的爆发难以进行实质性干预。<sup>⑤</sup>

欧盟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南高加索局势变化。欧盟与南高加索地区的联系开始于苏联解体后，但在较长时间内发展缓慢，2004年后双方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期，2008年的俄格冲突进一步加速了双方关系发展的进程。<sup>⑥</sup>同年，欧盟推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进一步扩展了“欧洲睦邻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这一政策计划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提供经济

---

① M. Hakan Yavuz and Michael M. Gunter, eds.,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 326.

② 孙超：《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2期，第148-150页。

③ M. Hakan Yavuz and Michael M. Gunter, eds.,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p. 329-330.

④ “US Silence on Armenia-Azerbaijan Conflict Reflects International Disengagement,” *The Guardian*, October 4,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oct/04/us-armenia-azerbaijan-nagorno-karabakh>.

⑤ 李静雅：《第二次纳卡战争背后的各方战略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第34页。

⑥ Kanan K. Dadashov et al., “History of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uth Caucasus and the EU,” *Webology*, Vol. 19, No. 1, 2022, p. 5641.

与社会方面的援助，以加强欧盟与南高加索地区的经济联系和推动该地区经济、政治改革，进一步提高欧盟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sup>①</sup> 在地区安全方面，欧盟尝试调解南高加索地区冲突，试图在“明斯克进程”中影响纳卡问题的解决，但该进程的提议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且受到官僚化、机制化影响，因而难以发挥作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由于其紧迫性远超纳卡冲突，有关南高加索的议题在欧盟内部议程中的地位下降。<sup>②</sup> 欧盟内部就与俄罗斯关系问题也存在较大分歧，部分欧盟成员国希望以经济、社会交流的方式加强与东部伙伴国家的关系，同时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地缘政治冲突的愿景受到挑战。这一分歧延伸到南高加索地区，使欧盟的南高加索政策模糊且缺乏稳定性。<sup>③</sup> 2015 年，欧盟进行周边政策探讨，认为之前的政策在对待不同的近邻国家时缺乏差异化，未来需要加以区分，而对待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政策未在优先序列内。<sup>④</sup> 2016 年，英国脱欧也影响到欧盟与南高加索国家的联系。英国曾经是支持与南高加索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重要力量，它的退出使欧盟内部对于南高加索的态度更加消极，也导致欧盟预算的减少，可以给予南高加索地区的支持进一步减少。<sup>⑤</sup>

在 2020 年纳卡冲突爆发之前，欧盟更多以“软实力”影响南高加索地区，支持民间社会主导的和平建设计划，更强调经济、社会合作，但受制于多种因素，取得的效果十分有限。在地区安全方面，欧盟缺乏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难以真正影响该地区冲突的解决。<sup>⑥</sup> 纳卡冲突爆发后，欧盟没有明确的授权，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声音，<sup>⑦</sup> 解决冲突的意愿不强且能力有限，使得其在纳卡问题上的影

① 宋黎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意图、推进与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85-91 页。

② 孙超：《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47 页。

③ 丁鹏、朱贵昌：《冷战后欧盟对东部伙伴关系国的战略演变》，《国际论坛》2020 年第 4 期，第 31-32 页。

④ 崔洪建等：《欧盟全球外交安全战略及其影响》，《CIIIS 研究报告》2017 年第 18 期，第 22-23 页，<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1223/7025133164002111.shtml>。

⑤ 丁鹏、朱贵昌：《冷战后欧盟对东部伙伴关系国的战略演变》，《国际论坛》2020 年第 4 期，第 31 页。

⑥ Kamala Valiyeva, “The EU’s Eastern Partnership: Normative or Geopolitical Power Projection?” *Easter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7, No. 2, 2016, pp. 25-26.

⑦ Laurence Broers, “Perspectives | The EU and Karabakh: Picking up the Pieces, Looking for a Role,” Eurasianet, January 20, 2021, <https://eurasianet.org/perspectives-the-eu-and-karabakh-picking-up-the-pieces-looking-for-a-role>.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响力不断降低，给其他行为体提供了机会。

### 2.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实力对比

国家综合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衡量：潜在权力与军事权力。潜在权力中最重要的是以财富和总人口为代表的可以转换为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要素。<sup>①</sup> 亚美尼亚人口下降趋势直到 2011 年才得以遏制，在此后也只是保持极低的增长率，这与阿塞拜疆人口连年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两国之间的人口差距不断拉大（参见图 2）。亚美尼亚经济发展依赖于出口导向型产业和侨民汇款，本国能源较为紧缺，对于俄罗斯依赖性强，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不稳定。<sup>②</sup> 阿塞拜疆则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国家经济发展迅速，2003—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 11.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独联体内排名前三，被誉为“南高加索发展的火车头”。<sup>③</sup> 纳卡冲突爆发前，阿塞拜疆经济虽受全球油价下降、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增长放缓，但仍对亚美尼亚保持绝对优势（参见图 3）。

国家的军事实力也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是以其陆军规模以及与之相配的海空力量为基础的，所发挥的作用在与对手的比较中尤为重要。<sup>④</sup> 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具有较大的军事优势。依据 2020 年全球武力评估（Global Firepower）数据来衡量，阿塞拜疆排名第 68 位，远高于亚美尼亚的第 111 位。<sup>⑤</sup> 阿塞拜疆军费开支亦远高于亚美尼亚（参见图 4）。在 2020 年纳卡冲突爆发前，阿塞拜疆采购大量拜拉克塔尔-TB2（Bayraktar TB2）和“苍鹭”-TP（Heron-TP）无人机以及 MAM-L 轻型智能炸弹（MAM-L Lightweight Smart Micro Munition）等先进武器装备。而亚美尼亚则仍依赖苏联时期的火炮、坦克等装备，

---

①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2 页。

② “Armenia Energy Profile,” IEA, December 2021, <https://www.iea.org/reports/armenia-energy-profile>.

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阿塞拜疆（2021 年版）》，第 12 页，<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asaibaijiang.pdf>。

④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2 页。

⑤ Global Firepower 是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参考排名，其采用 50 多个不同指标来确定不同国家的 Power Index 分数，类别涵盖武器装备、后勤能力等多个方面。参见“Global Firepower Countries Index,” Global Firepower,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php>; Maria Gourtsilidou, “Ranked: Military Strength of Nations, 2020 (Comparing Global Armed Forces),” Ceoworld Magazine, March 3, 2020, <https://ceoworld.biz/2020/03/03/ranked-military-strength-of-nations-2020-comparing-global-armed-forces/>。

在战争中与阿塞拜疆的能力差距极为明显。<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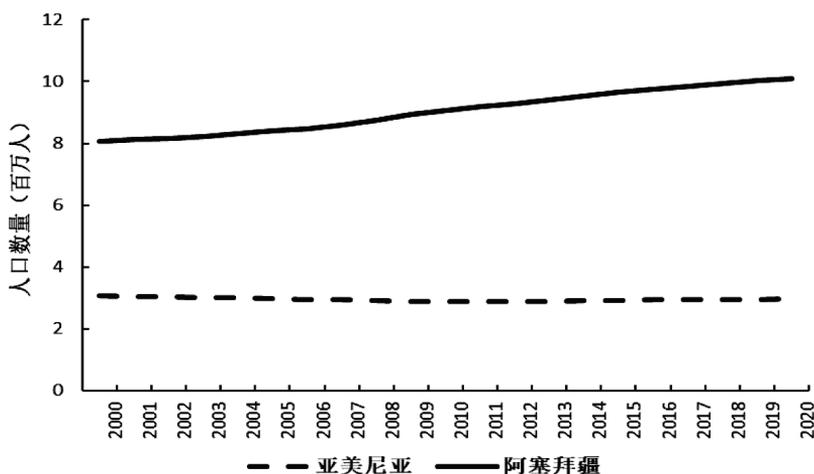


图 2 2000—2020 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总人口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总人口统计，<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locations=AZ-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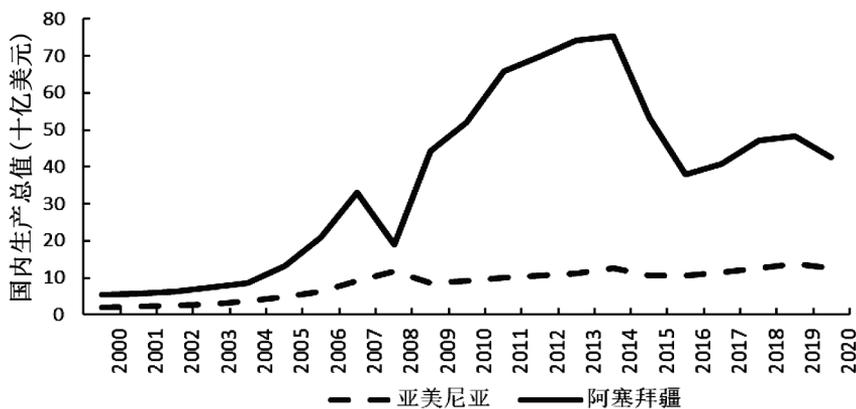


图 3 2000—2020 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AM-AZ>。

<sup>①</sup> Gubad Ibadoglu, “Why Azerbaijan Won? Hi-tech Weapon Systems Bought with Oil Revenue Ultimately Tipped the Balance,” Institute for War & Peace Reporting, November 17, 2020, <https://iwpr.net/global-voices/why-azerbaijan-won>;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SIPRI,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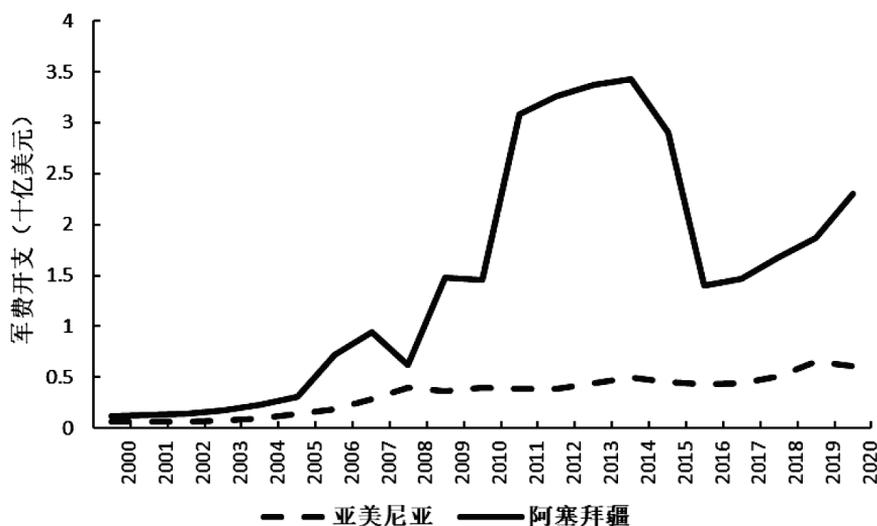


图4 2000—2020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军费开支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军费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换算，<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MS.MIL.XPND.GD.ZS?contextual=aggregate&end=2020&locations=AM-AZ&start=2000&view=chart>。

综上，“机会窗口”的外部构成——南高加索地区形势变化有利于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一方面，俄罗斯、美国与欧盟由于相对实力下降、战略重心调整、内部意见分歧等原因，对于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逐步减小，介入纳卡冲突的能力和意愿较低。这为邻近的地区性大国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从人口、经济总量、军事实力和军费投入四个角度衡量，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实力对比对于阿塞拜疆更为有利，土耳其支持更有可能获胜的一方，就有更大概率分享胜利成果，也更有可能实现其南高加索政策目标。

### 五 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机会窗口”的内部构成

“机会窗口”的内部构成受到政治制度变迁与精英联盟变化（修宪进程下总统权力扩大与“人民联盟”的形成）、主流文化思潮的变化（国内社会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怀旧”情绪增加）和与冲突国家关系的变化（土亚和解失败后，加深亚美尼亚“敌人”、阿塞拜疆“朋友”的观念）的影响。三者的共同作用影响到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动员，进而影响到土对于“机会窗口”的认知。

### （一）政治制度变迁与精英联盟的变化

土耳其政治制度变迁对于其“进取性”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极为关键。政治制度的变化落实于宪法之中，通过对修宪进程的追踪有助于理解总统制对于土耳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修宪的历程也涉及精英联盟的分化重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由对立转向合作对外交政策合法性的影响同样需要关注。

正发党对于宪法的修改是循序渐进的。该党曾于2007年、2010年和2017年三次发起修宪公投，其中2007年的公投为从议会制向总统制转变打下了基础。在2007年总统选举中，军方曾强烈反对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竞选总统，军方与正发党进行了多轮博弈后最终妥协。这一过程使民众观察到总统选举制的不足，并认为其可能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促使多数民众在随后的修宪公投中支持总统直选改革。<sup>①</sup> 2010年公投的重点是修改法院和检察官理事会成员的选举方式，以及限制军方干政的权力，从法理上限制竞争对手的力量。<sup>②</sup> 2014年，土耳其进行了首次总统直选，正发党主席埃尔多安的竞选成功使土耳其事实上进入“半总统制”，正发党也同时控制了议会，弱化了其对埃尔多安的制衡，内政外交大权实际上都掌握于总统手中。<sup>③</sup> 在赢得选举后，正发党继续推动政体变迁的修宪。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暴露了土耳其的内部矛盾，促使埃尔多安推动新一轮修宪。<sup>④</sup> 2017年修宪完成了对政治制度的变迁，结束了土耳其一百多年的议会制政体，转变为总统制政体。新宪法修正案弱化了议会的权力，包括对于行政机构的监督权和质询权，其立法权也受到了限制。新修正案规定总统对议会决议具有否决权，而议会对于总统的否决需要得到议会绝对多数的同意。在行政权方面，取消了向议会负责的部长会议，将行政权集中于总统一身。总统是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有权任命政府高级官员，总理与内阁的废除使总统获得了对于内政外交的绝对控制权。<sup>⑤</sup> 总统制增强了总统对于外交政策合法性的影响，以及塑造社

① 李艳枝：《正义与发展党修宪与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2期，第78-79页。

② 魏敏：《从议会制到总统制：土耳其政治转型的进程与影响》，《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第58页。

③ 杨晨：《从议会制到总统制：制度转型与土耳其的政治选择》，《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1期，第65-66页。

④ Zafer Yılmaz, “Erdoğan’s Presidential Regime and Strategic Legalism: Turkish Democracy in the Twilight Zone,”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20, No. 2, 2020, p. 268.

⑤ 土耳其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可参见 Serap Yazıcı,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of 2017: Transition to Presidentialism in Turkey,” September/October, 2017, [https://www.nyulawglobal.org/globalex/2017\\_Turkey\\_Constitution\\_Amendments.html](https://www.nyulawglobal.org/globalex/2017_Turkey_Constitution_Amendments.html).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会舆论的能力，有助于持续的国内政治动员。

土耳其政治制度变迁与国内精英联盟的变化密切相关。2015年正发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曾受到其他党派的强烈反对，无论采取议会投票直接改制，还是诉诸全民公投改制，都无法通过宪法修正案，修宪陷入僵局。<sup>①</sup>正发党采取了分化反对联盟的策略。在土耳其周边安全形势恶化和国内政局动荡的背景下，这一策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民族行动党的态度发生转变。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后，民族行动党开始与正发党进行谈判。在其政治诉求得到一定满足的基础上，民族行动党选择支持推动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修宪，并在2016年12月与正发党共同向议会提交修宪议案，推动修宪公投在议会通过。<sup>②</sup>

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的合作有助于增强土耳其处理纳卡问题的政策合法性。两党在2018年选举前进一步深化合作，结成“人民联盟”参与竞选。虽然两党之间达成的具体政治交易尚不得而知，但作为竞选联盟，正发党需要将一部分民族行动党的政治诉求吸纳入其执政纲领。民族行动党作为极右翼政党，主张推行“泛突厥主义”，希望“突厥”国家联合，认同与阿塞拜疆同一“民族”的身份，强调土亚之间的历史性仇恨以及亚美尼亚给土耳其造成的伤害，在处理纳卡问题上持极为强硬的立场。<sup>③</sup>精英联盟的形成成为土耳其采取更激进外交政策奠定了共识，也为之后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的动员做好了准备。

### （二）主流文化思潮的变化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也受到主流文化思潮变化的影响。主流文化思潮构成了土耳其外交政策国内政治动员重要的话语文化背景。“话语机会结构”理论认为，了解社会文化背景，有助于理解何种动员框架更容易成功，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国内政治动员中“政治机会结构”的构成要素。<sup>④</sup>通过观察土耳其主流文化思潮——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怀旧”——如何被政治力量操纵和运用，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动员。

---

① 郑东超：《土耳其内政外交变动及对中东格局的影响》，《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6期，第62页。

② S. Erdem Aytaç, Ali Çarkoğlu and Kerem Yıldırım, “Taking Sides: Determinants of Support for a Presidential System in Turkey,”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 22, No. 1, 2017, p. 16.

③ Tolga Er, “The Positions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and Turkey-Armenia Relations,” December 1, 2017, <https://caucasusedition.net/wp-content/uploads/2017/12/Turkey-Political-Parties.pdf>.

④ 卜玉梅、周志家：《西方“话语机会结构”理论述评》，《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6期，第76-77页。

相比之前时期，正发党尤为注重在宗教与历史层面对奥斯曼遗产的利用。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紧密相关。伊斯兰教将各部落凝聚在一起，对于前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奥斯曼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sup>①</sup> 在奥斯曼帝国建立后，伊斯兰教融入到帝国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民众的认同。虽然曾受到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的压制，但随着民主化的发展，伊斯兰教对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影响不断上升。正发党将奥斯曼帝国记忆与伊斯兰教高度绑定，推动“伊斯兰民粹主义”的发展，这一观念成为国内社会动员的重要力量。<sup>②</sup> 正发党也非常强调对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念。埃尔多安曾提出土耳其“六百年愿景”与“千年愿景”。“六百年愿景”回顾的是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的顶峰时期（1453年），代表着奥斯曼历史的辉煌；而“千年愿景”是土耳其对于奥斯曼帝国起源的官方叙事，认为土耳其源于塞尔柱突厥人，从而强调其突厥血统。<sup>③</sup>

对奥斯曼帝国的“怀旧”在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动员上起到两点作用。第一，通过描绘奥斯曼帝国的伟大历史，唤起民众的自豪感，从而提高采取“进取性”外交政策的合法性。<sup>④</sup> 通过怀念奥斯曼帝国曾经的强盛，与现在所处中等强国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说服民众支持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土耳其强调“恢复”与前奥斯曼帝国领域内国家的历史联系，并将其纳入“自我”的范围。土耳其前外交部部长达武特奥卢就提出“共同历史的人民”（*Tarihdas*）一词，特指生活在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人民。<sup>⑤</sup> 第二，通过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重新解读，维持特定身份叙事的连续性，从而为外交政策寻找理由。<sup>⑥</sup> “怀旧”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也就继承下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根源与矛盾冲突的记忆。奥斯曼帝国起源于“突厥”，所以“突厥”也成为土耳其民众认同的一个方面，与同具有“突厥”身份的国家就有了历史亲近

① 周少青、和红梅：《土耳其国家认同的历史演变及当代困境》，《学术界》2022年第4期，第201页。

② 严天钦：《土耳其正义发展党的伊斯兰民粹主义》，《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4期，第33-40页。

③ 咎涛：《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梦”——兼谈“一带一路”下的中土合作》，《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69-72页。

④ M. Hakan Yavuz,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80-181.

⑤ Cenk Saraçoğlu and Özhan Demirkol,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in Turkey under the AKP Rule: Geography,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3, 2015, pp. 311-312.

⑥ 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67-68页。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感。这反映到土外交政策中，就表现为其希望推动“突厥”国家合作与团结。同时，“怀旧”也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与亚美尼亚历史冲突关系的过往记忆。对于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Armenian Genocide）事件的不同认知始终是两国关系缓和的重要障碍。土耳其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对于这一问题更多强调亚美尼亚人在战争时期“叛国”，与俄罗斯军队合作反对奥斯曼帝国，从而导致了对于亚美尼亚人的“迁徙”。<sup>①</sup>土政府还强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奥斯曼帝国各民族都受到了损失，而非单独亚美尼亚民族的损失。<sup>②</sup>在土耳其社会生活中，“亚美尼亚人”也逐步成为一个象征“叛徒”“内部敌人”的词汇而受到污名化，深刻影响到土民众对于两国关系的看法。<sup>③</sup>

### （三）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两个冲突国家关系的变化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也受到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两国关系的影响，而土耳其与两国的关系又受到对于奥斯曼帝国“怀旧”这种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这种主流文化思潮具有一定的历史稳定性，从而影响到民众对于国家间身份的认知。但身份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的，“关键节点”的选择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一“关键节点”就是2008年前后土亚关系正常化的尝试，但此次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从而对土耳其南高加索政策产生了“锁定”效应，进而推动了土耳其在2020年支持阿塞拜疆、介入纳卡冲突的国内政治动员。

土亚关系正常化进程是在美国的支持以及土耳其“零问题”外交政策影响下开启的，2008年两国政府间的“足球外交”标志双方关系正常化进程进入“加速期”。土耳其总统居尔接受亚美尼亚总统阿尔缅·萨尔基相（Armen Sarkissian）的邀请，前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观看世界杯预选赛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之间的比赛。之后亚美尼亚总统也回访布尔萨观看了两队的第二场比赛。从这一事件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迅速发展，2009年8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开始进行“旨在建立外交关

---

① “The Armenian Allegation of Genocide: The Issue and the Facts,”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mfa.gov.tr/the-armenian-allegation-of-genocide-the-issue-and-the-facts.en.mfa>.

② Ahmet Davutoğlu, “A just Memory for All,”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y 4, 2014, [https://www.mfa.gov.tr/a-just-memory-for-all-article-by-h\\_e\\_ahmet-davutoglu\\_minister-of-foreign-affairs-of-turkey.en.mfa](https://www.mfa.gov.tr/a-just-memory-for-all-article-by-h_e_ahmet-davutoglu_minister-of-foreign-affairs-of-turkey.en.mfa).

③ Vicken Cheteria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Genocide and the Making of the Karabakh Conflict,” *Europe-Asia Studies*, Vol. 70, No. 6, 2018, p. 891; Adam Taylor, “Is ‘Armenian’ an Insult? Turkey’s Prime Minister Seems to Think so,” August 6,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4/08/06/is-armenian-an-insult-turkeys-prime-minister-seems-to-think-so/>.

系的谈判”。两国于 2009 年 10 月达成了《建立外交关系议定书》和《发展双边关系议定书》，规定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在两个月后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并加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合作。<sup>①</sup>

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遭受到巨大阻力。上述两份议定书首先在亚美尼亚宪法法院受到审查，法院质疑了作为双方议定书前提的序言，认为亚美尼亚需要坚持让国际社会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同时并不放弃对“西亚美尼亚”领土的主权，也要求进一步明确两国关系正常化与纳卡冲突的关系。<sup>②</sup> 土耳其政府批评了亚美尼亚宪法法院的决议，认为这动摇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最终，协议在两国议会均未获得通过。根据民意调查，土耳其仅有 29% 的人支持协议，55% 的人表示反对，说明土耳其尚不具备改变原有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sup>③</sup>

土亚和解进程的失败成为土与阿亚关系变化的“关键节点”，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关系进一步升温，与亚美尼亚关系则更加敌对。亚美尼亚进一步向俄罗斯靠拢。2010 年，俄罗斯与亚美尼亚达成协议，将俄军事基地的使用时间延长至 2044 年，并宣布俄将通过提供新武器来加强亚美尼亚的防御。<sup>④</sup> 亚美尼亚也在和解进程失败后，对于土耳其的宣传更加强调“敌人”和“威胁”的一面，加剧了亚美尼亚民众对于土耳其的敌视。这反过来也影响到土耳其民众对于亚美尼亚的态度，在土耳其社会中，支持与亚美尼亚无条件关系正常化的声音愈发微弱，而对于亚美尼亚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sup>⑤</sup> 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失败后，土耳其民众认为在对其国家具有“威胁”的国家排名中，亚美尼亚始终位于前列。<sup>⑥</sup>

土亚和解进程失败后，土阿关系愈发紧密。2010 年两国正式签订军事同盟协

---

① Michael Gunter and Dirk Roctus, “Special Report: The Turkish-Armenian Rapprochement,”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19, No. 2, 2010, p. 168.

② David L. Phillips, “Diplomatic History: The Turkey-Armenia Protocol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March 2012, pp. 67-68, <https://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doi/10.7916/D8HM5HHQ/download>.

③ David L. Phillips, “Diplomatic History: The Turkey-Armenia Protocol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March 2012, p. 72, <https://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doi/10.7916/D8HM5HHQ/download>.

④ Zafer Yıldırım,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zerbaijan: From ‘Alliance’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4, 2012, p. 10.

⑤ Vahram Ter-Matevosyan, “Deadlocked in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Revisiting Armenia-Turkey Relations,”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0, No. 3, 2021, p. 164.

⑥ 具体数据参见“Public Perceptions o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Kadir Has University Center for Turkish Studies. 其中 2019—2021 年的报告参见 <https://www.khas.edu.tr/en/khas-institutional-research/>; 2017 年报告参见 [https://www.mustafaaydin.gen.tr/source/TDP-2017\(EN\)\\_vfinal.pdf](https://www.mustafaaydin.gen.tr/source/TDP-2017(EN)_vfinal.pdf).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定，规定在遭到第三方“侵略”的情况下，双方将“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互相帮助。这奠定了土耳其在军事层面支持阿塞拜疆的法律基础。此后，土阿两国又签订多份军事协议，进一步落实 2010 年军事同盟协定的具体内容。<sup>①</sup> 土阿两国关系从政治、军事领域一直延伸到经济、文化领域。在经济领域，阿塞拜疆是土耳其重要的能源保障国，土耳其也是阿塞拜疆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sup>②</sup> 在文化层面，双方近年沟通更为紧密，许多阿塞拜疆年轻人前往土耳其接受教育和培训，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使用拉丁字母。2015 年，双方还发行了统一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突厥通史》，之后还将继续编写《突厥地理》和《突厥文学》等教科书，维系双方的历史与文化情感。<sup>③</sup> 2021 年“突厥语国家组织”成立，又加强了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在多边领域的制度化合作，推动了两国“复合身份政治”的发展。<sup>④</sup> 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土耳其民众视阿塞拜疆为关系最友好的国家，这为纳卡冲突中土耳其全力支持阿塞拜疆的国内政治动员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上借鉴“政治机会结构”概念，从三个层面分别探讨了“机会窗口”的内部构成——国内政治动员的过程。在政治体制变迁与精英联盟变化层面，土耳其修宪进程增强了总统的外交决策权，提高了外交政策制定的合法性，降低了推行外交决策的阻力。在修宪进程中，精英联盟进行了重新分化与组合，稳固了正发党的执政地位，也为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奠定了精英共识的基础。在主流文化思潮变化层面，土耳其兴起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怀旧”思潮，继承奥斯曼帝国历史与宗教记忆，延续了帝国的辉煌记忆与历史仇恨，为土耳其与阿亚两国关系和对纳卡冲突的看法提供了宏观文化基础。在与冲突国家关系变化层面，土亚关系和解失败成为“关键节点”，使土耳其与两国的关系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土耳其国内将亚美尼亚视为“敌人”，将阿塞拜疆视为“朋友”。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土耳其逐步完成了对于介入纳卡冲突的国内政治动员。

至此可以看到各方面影响因素皆已具备。2020 年 7 月，阿亚两国边境的小规

---

<sup>①</sup> Nelli Minasyan, “Pan-Turkism Manifestations of Turkey-Azerbaijan Military-Political Cooperation,” *Scientific Artsakh*, Vol. 11, No. 4, 2021, p. 46.

<sup>②</sup> Saltanat Berdikieva, “Turkey’s Intervention Threatens to Expand Conflict in Nagorno-Karabakh,” *Inside Arabia*, October 23, 2020, <https://insidearabia.com/turkeys-intervention-threatens-to-expand-conflict-in-nagorno-karabakh/>.

<sup>③</sup> 曹鹏鹏：《土耳其对外高加索地区的政策及其困难》，《战略决策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69 页。

<sup>④</sup> 孙德刚、章捷莹：《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2 期。

模冲突成为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机会窗口”开启的“危机事件”，显著提高了问题的紧迫性，成为连接国内外因素的桥梁。俄、美、欧三方对介入南高加索意愿及能力的下降、阿亚实力对比的客观环境使得土耳其具有介入纳卡冲突的能力。经过长时间的国内政治动员，总统外交决策自主性提升，国内社会广泛支持阿塞拜疆、反对亚美尼亚的认知不断加深，显著提升了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决策的合法性。至此，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的“机会窗口”已经完全开启。

## 六 土耳其对介入纳卡冲突“机会窗口”的把握

在介入纳卡冲突的“机会窗口”开启后，土耳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采用对阿塞拜疆军事支持、外交支持和影响停火进程三种方式迅速、深度地介入纳卡冲突。

### （一）对阿塞拜疆的军事支持

首先，土耳其以两国共同军演的形式支持阿塞拜疆。2020年7月29日—8月10日，两国在阿塞拜疆境内展开规模宏大的军演，双方陆军与空军均参加演习。<sup>①</sup>此次军演体现出土耳其对于阿塞拜疆的军事支持，是对亚美尼亚的一种威慑。演习结束后，土耳其并未将军队和装备全部撤出，而是将多架 F-16 战机留在阿塞拜疆境内以威慑亚美尼亚。<sup>②</sup>纳卡冲突爆发后，亚美尼亚方面宣称这些土耳其战机参与了对亚的进攻。<sup>③</sup>

其次，土耳其以军售的形式支持阿塞拜疆。纳卡冲突前土对阿军售明显增加。2010—2019年，土耳其只占阿塞拜疆军售的 2.9%，排名仅为第四位，<sup>④</sup>但 2020年土耳其在阿塞拜疆主要军购来源国排名中跃居第二位。阿塞拜疆在 2020年前9个月从土耳其购买了 1.23 亿美元的武器，是 2019年同期的 6 倍。尤其在冲突爆发前的 9 月份，土耳其向阿塞拜疆出售了 7 710 万美元的武器，<sup>⑤</sup>其中包括 TB2 无人

① “Azerbaijan, Turkey to Hold ‘Large-Scale’ Military Exercises This Week,” Anadolu Agency, July 16, 2020, <https://asbarez.com/azerbaijan-turkey-to-hold-large-scale-military-exercises-this-week/>.

② Mason Clark and Ezgi Yazici, “Erdogan Seeks to Upend Kremlin-Backed Status Quo in Nagorno-Karabak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October 12, 2020, <https://www.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erdogan-seeks-upend-kremlin-backed-status-quo-nagorno-karabakh>.

③ “Armenian Warplane ‘Shot Down by Turkish Jet,’”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September 29, 2020, <https://www.azatutyun.am/a/30864794.html>.

④ Jordan Smith, Pieter D. Wezeman and Alexandra Kuimova, “Arms Transfers to Conflict Zones: The Case of Nagorno-Karabakh,”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30, 2021,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er/2021/arms-transfers-conflict-zones-case-nagorno-karabakh>.

⑤ “Turkey’s Arms Exports to Azerbaijan Surge,” <https://graphics.reuters.com/ARMENIA-AZERBAIJAN/TURKEY-ARMS/ygdvznyamvw/media-embed.html>.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机、SOM 巡航导弹等尖端武器，这些装备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sup>①</sup>

再次，土耳其以威胁军事介入的形式支持阿塞拜疆。对于纳卡冲突中土耳其军队的角色，冲突双方的说法存在分歧。亚美尼亚方面多次宣称土耳其军队介入到纳卡冲突中，但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均表示否认。<sup>②</sup> 尽管如此，土耳其从未否认其参加战争的可能性。2020年10月21日，土耳其副总统福阿德·奥克塔伊（Fuat Oktay）表示，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之间有着军事同盟协定，如果阿塞拜疆提出请求，土耳其军队将毫不犹豫地前往阿塞拜疆参战。<sup>③</sup>

最后，土耳其以招募“雇佣军”的形式支持阿塞拜疆。有消息称土耳其从叙利亚地区招募雇佣军支援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官方多次批评土耳其招募的“雇佣军”具有“恐怖分子”性质，违背国际法且危害了地区和平，<sup>④</sup> 俄罗斯政府与法国政府也对这一问题表示关切。<sup>⑤</sup>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卫报》等组织和媒体对土耳其招募叙利亚雇佣军进行了持续报道。<sup>⑥</sup>

### （二）对阿塞拜疆的外交支持

首先，土耳其多次批评亚美尼亚的“侵略行为”，认为纳卡冲突是亚美尼亚破坏停火协议所导致的。2020年9月27日，纳卡冲突爆发后，土耳其外交部立刻发表声明，谴责亚美尼亚破坏停火协定，违背国际法对阿塞拜疆发动进攻，造

---

① Shaan Shaikh and Wes Rumbaugh, “The Air and Missile War in Nagorno-Karabakh: Lessons for the Future of Strike and Defense,” CSIS, December 8,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ir-and-missile-war-nagorno-karabakh-lessons-future-strike-and-defense>.

② Joshua Kucera, “Armenians Accuse Turkey of Involvement in Conflict with Azerbaijan,” Eurasianet, September 28, 2020, <https://eurasianet.org/armenians-accuse-turkey-of-involvement-in-conflict-with-azerbaijan>.

③ “Turkey Says Ready to Send Troops to Azerbaija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October 22, 2020, <https://www.azatutyun.am/a/30906863.html>.

④ “Armenia Condemns Turkey’s Involvement in Karabakh Fighting,”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September 28, 2020, <https://www.azatutyun.am/a/30862896.html>.

⑤ “Russian, Turkish Leaders Again Discuss Karabakh,”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October 27, 2020, <https://www.azatutyun.am/a/30915863.html>; “More Reports of Syrian Mercenaries Sent to Azerbaija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October 4, 2020, <https://www.azatutyun.am/a/30874617.html>.

⑥ “Nagorno-Karabakh Battles | Over 2,000 Mercenaries Sent to Azerbaijan, Nearly 135 Killed So Far,” 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 October 18, 2020, <https://www.syriaohr.com/en/188669/>; Siranush Ghazanchyan, “Syrian Recruit Describes Role of Foreign Fighters in Nagorno-Karabakh,” The Guardian, October 2,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oct/02/syrian-recruit-describes-role-of-foreign-fighters-in-nagorno-karabakh>.

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认为亚美尼亚是破坏地区稳定的最大障碍。<sup>①</sup> 土耳其总统、国防部、议会也都分别发表声明谴责亚美尼亚的“侵略”，支持阿塞拜疆的“自卫反击”。土耳其还批评亚美尼亚使用“恐怖分子”参与纳卡冲突，力图从国际人道法和战争合法性方面，对亚美尼亚施压。<sup>②</sup>

其次，土耳其批评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不支持阿塞拜疆进攻行动的言论与行为。土耳其首先对于明斯克小组表示不满，2020年9月29日，外交部部长恰武什奥卢批评欧安组织没有采取有效手段解决纳卡问题。<sup>③</sup> 之后，埃尔多安在土耳其议会第四届立法会议上批评由俄罗斯、美国和法国组成的明斯克小组主席国所发出的停火呼吁，认为由这三个主席国在多年的无所作为后发出停火呼吁并不合理。<sup>④</sup> 土耳其也对欧洲议会、联合国人权组织有关纳卡冲突的评价与举措表示不满。<sup>⑤</sup>

再次，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进攻行为持鼓励态度。土耳其官方多次表示，只有亚美尼亚撤出其一直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纳卡地区才有可能实现永久和平。<sup>⑥</sup> 在阿塞拜疆夺取纳卡重镇舒沙后，土耳其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部长和总统发言人都向阿塞拜疆表示了祝贺。<sup>⑦</sup>

最后，在纳卡冲突期间，土耳其政府要员多次以外交访问的方式支持阿塞拜疆。

---

① “Turkey Condemns Armenian Attack on Azerbaijan,”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September 27,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596377>.

② “Hulusi Akar: Armenia Must Stop Attacks, Send Back Its Mercenaries,”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September 28,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597637>; “Turkish Parliament Releases Joint Declaration Condemning Armenian Attacks on Azerbaijan,” Daily Sabah, September 28, 2020, <https://www.dailysabah.com/politics/turkish-parliament-releases-joint-declaration-condemning-armenian-attacks-on-azerbaijan/news>; “Turkish President Recep Tayyip Erdogan Phoned President Ilham Aliyev,”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September 27,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596489>.

③ “Mevlut Cavusoglu: Armenia’s Withdrawal only Solution to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September 29,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598729>.

④ “Turkey to Continue Supporting Baku ‘With All Means’,”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October 1,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601067>.

⑤ “Ankara Slams ECHR over Interim Measures Against Turkey,”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October 7,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606481>; “Turkish Foreign Ministry: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s Special Procedures Mechanism are Detached from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November 14,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642175>.

⑥ “Turkish President Recep Tayyip Erdogan Phoned President Ilham Aliyev,”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September 27,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596489>; “Mevlut Cavusoglu: Armenia’s Withdrawal only Solution to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September 29,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598729>.

⑦ “Turkey Congratulates Azerbaijan over Shusha’s Liberation,”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November 8,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636997>.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2020年10月6日和11月1日，土耳其外交部部长两次访问阿塞拜疆，表达对阿塞拜疆的全面支持。10月19日，土耳其国民议会议长穆斯塔法·森托普（Mustafa Sentop）访问阿塞拜疆，受到热情接待。在整个战争期间，土耳其官员访问阿塞拜疆的次数明显增多，给整体外交环境陷于被动的阿塞拜疆提供了支持。

### （三）影响纳卡冲突持续时间和停火协议内容

纳卡冲突期间，明斯克小组主席国多次尝试调停，但均未能阻止战争的继续。土耳其对相关大国在纳卡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予以尖锐批评。2020年10月1日，土耳其批评明斯克小组主席国俄罗斯、美国和法国发出的停火呼吁，认为阿塞拜疆进行的是争取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唯有阿塞拜疆收复被侵占的领土，纳卡地区才可能实现永久和平。<sup>①</sup>10月8日，土耳其国防部部长表示，亚美尼亚从纳卡撤军是和谈的前提，各国应呼吁亚美尼亚从其侵占的领土上撤军，而不是呼吁停火。<sup>②</sup>

土耳其在纳卡冲突调停中起到关键作用。亚美尼亚政府10月13日表示，“只有土耳其改变其态度，阿塞拜疆停火才有可能”。<sup>③</sup>美国和法国政府批评土耳其在停火过程中所起的消极作用，认为纳卡冲突的升级是由土耳其的态度与行为所导致的。<sup>④</sup>俄罗斯在10月10日独自调停失败后，也注意到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增加与土耳其的沟通。10月11日—11月10日，俄土两国元首、外长、防长进行了多次沟通，在此期间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态度发生了较大改变。在10月27日两国元首会谈时，俄罗斯仍在强调明斯克小组对于和平进程的主导性，明确否定土耳其更多参与进程的可能性。<sup>⑤</sup>此后俄罗斯态度发生转变，11月3日，俄

---

① “Turkey Sides with Azerbaijan Against Armenia’s Occupation, Erdoğan Says,” Daily Sabah, October 1, 2020, <https://www.dailysabah.com/politics/diplomacy/turkey-sides-with-azerbaijan-against-armenias-occupation-erdogan-says>.

② “Turkey: Armenia should Withdraw before Cease-Fire,” Azerbaijan State News Agency, October 1, 2020, <https://azertag.az/en/xeber/1608141>.

③ “Only Change in Turkey’s Stance Can Unlock Karabakh Settlement, Says Pashinia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October 14, 2020, <https://www.azatutyun.am/a/30891626.html>.

④ “France Demands End to Turkish ‘Provocations’ in Karabakh,”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October 23, 2020, <https://www.azatutyun.am/a/30908919.html>; “Pompeo Criticizes Turkey’s Involvement in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Voice of America, October 16, 2020, [https://www.voanews.com/a/south-central-asia\\_pompeo-criticizes-turkeys-involvement-nagorno-karabakh-conflict/6197227.html](https://www.voanews.com/a/south-central-asia_pompeo-criticizes-turkeys-involvement-nagorno-karabakh-conflict/6197227.html).

⑤ “Russian, Turkish Leaders Again Discuss Karabakh,”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October 27, 2020, <https://www.azatutyun.am/a/30915863.html>.

外长表示,冲突的解决需要俄土双方更紧密的合作,希望土可以发挥更多作用。<sup>①</sup> 最终停火协议的时间也受到土耳其方面的较大影响,土方要求只有在阿塞拜疆夺取舒沙后才会同意进行停火谈判。11 月 9 日的最终停火协议的签署国中虽然没有土耳其,但俄罗斯方面允许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区承担更多责任。<sup>②</sup>

如上所述,土耳其在“机会窗口”打开后,采用对阿塞拜疆提供军事支持、外交支持以及影响阿亚关于纳卡冲突持续时间和停火协议内容等三种方式介入纳卡冲突。在资源配置方面,土耳其以尽可能低成本的方式为阿塞拜疆提供支持,即使采用军事协助的方式,也更多以军事援助、第三方军事支持和本国军队非官方参与等形式介入,并未选择以成本高、合法性低的官方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介入冲突。这一方面降低了国内反对的声音,避免“死亡人数综合征”对政策灵活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与大国产生直接冲突,没有触碰大国核心利益,使土耳其能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应对国际压力。在战略目标上,土耳其虽希望阿塞拜疆全面收复纳卡地区,但这一目标难以达成。在实际操作中,土耳其退而求其次,选择在阿塞拜疆夺取舒沙后推动停火协议生效。其战略目标灵活且有效,既通过支持阿塞拜疆增强了其在南高加索地区和突厥语国家组织中的影响,也对俄罗斯在区域内的地位表达了隐晦的尊重,从而减少了行动的阻力。

## 结论与讨论

通过引入“机会窗口”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本文在理解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的行动中同时关注三个维度: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客观环境与主观认知。从历史与现实角度观察,土耳其继承奥斯曼帝国遗产,依据现实政治的需要,选择性地对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历史记忆进行阐释,有助于动员民众、增强政策的合法性。从国际与国内角度观察,土耳其的“进取性”外交政策需要审慎地平衡大国利益,也需要获得国内社会的支持。从客观环境与主观认知角度观察,土耳其周边地区相关国家的战略与实力发生变化,地区权力的此消彼长为其外交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机遇。这一机遇被土政府认知与把握,进而推动其“进取性”外交政策的实施。

<sup>①</sup> “Russia Calls for Ceasefire Control Mechanisms in Karabakh,”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November 4, 2020, <https://www.azatutyun.am/a/30929229.html>.

<sup>②</sup> “Turkey, Russia ‘at Odds over Turkish Military Post in Azerbaija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November 23, 2020, <https://www.azatutyun.am/a/30964867.html>.

##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土耳其进取性外交政策并非“鲁莽”或“冒险”，而是在环境适宜基础上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在特定的危机形势下，土耳其会在综合权衡周边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动和国内政治合法性变化的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外交或安全反应。从目前的结果看，土耳其不仅在纳卡冲突中表现抢眼，而且在各周边地区均呈现出主动、灵活的外交态势。当然，这种态势能否持续，不仅取决于土耳其决策层的审时度势和灵活反应能力，也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国家实力的消长。从这个意义上看，土耳其可能难以长期维持这种“四面出击”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就分析框架的价值而言，本文整体可被视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范畴。不过，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的差异在于：本文的分析框架更多地关注地区层面而非国际体系层面主要国家间权力分布的状况及其变化；本文特别强调突发事件对于激励特定国家启动相关行为的重要意义。这一分析框架也对“机会窗口”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将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政治机会结构”概念与国际安全研究中的“机会窗口”概念进行必要的整合，可为“机会窗口”这一概念赋予更为连贯也更为充实的内涵，避免将其泛化为综合分析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本文也拓宽了“机会窗口”解释框架的适用范围，尤其是在第三国介入地区冲突研究中的应用。或许可以推测，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对于理解相关国家针对突发安全事件而作出的反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第一，本文的理论框架选取了国内政治动员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五个影响因素，这未必穷尽了有关“机会窗口”的所有影响因素，且未能厘清其中何种因素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此外，本文不是纯粹的解释性研究，因为“机会窗口”的认知和把握因人、因国而异，难以进行纯粹的因果关系构建。第二，受制于篇幅和操作难度，本文未能就决策者对于“机会窗口”的感知变化进行更全面的论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为“机会窗口”的开启设定了两个标准，即外部权力分布有利与内部合法性较高。不足之处在于，这种观察或许同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能完全消除读者对研究者主观解读的质疑。第三，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语言有限，本文缺乏对土耳其语相关文献的引证，或许会导致本文对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的过程、原因等的分析存在不准确、不全面之处。这些不足希望能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完善。

【来稿日期：2022-11-15】

【修回日期：2022-12-25】

【责任编辑：李水生】

“whole system” “wide coverage” “quick response” and “strong synergy.” Coupled with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resulting from the “zero casualty” feature of unmanned weapons, the weaker side’s resistance abilities based on the “offset and killing” strategy will suffer qualitative changes, while the original gap between the two sides will be quantitatively increased. In the event of no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 checks and balances, the risk of the vicious evolution of asymmetric security relations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under the two-way paths of technological monopol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prospect of “marketization warfare,” lower casualty costs will lead to a lack of constraints in power politics, the low-risk advantages will encourage politicians to make risky decisions, and the decline of war ethics will distort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asymmetric wars. The extreme means of survival adopted by the weaker side may cause “secondary hazards” such as nuclear prolifer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West-led arms control cooperation, China needs to coordina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unmanned weap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an overall framework. At the same time, enough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efforts to actively develop countermeasure technologies an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relevant arms control proposals.

[Keywords] network-based autonomy, resistance capacity, asymmetric war, marketization wa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hors] LIU Zuoli,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UI Shoujun,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ssociate Dean of School of Global Gover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 49 **Waiting in the Wings: Turkish Involvement in the Second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ndows of Opportunity**

ZENG Xianghong and WANG Haoyu

[Abstract] Turkey’s high-profile involvement in the second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which broke out in September 2020, epitomizes Turkey’s risky moves in the South Caucasus. Why did Turkey choose to intervene in the conflict when faced with multiple risks? Applying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ramework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urkey’s aggressive involvement in the second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awareness and grasp of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involves factors like emergence of “crisis event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crisis event of the Azerbaijan-Armenia border conflict was the catalyst for Turkey to initiate relevant actions after an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The international factors considered by Turkey at that time includ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game among major powers in the South Caucasus and the power contrast between Azerbaijan and Armenia. There were also domestic factors for the Turkish intervention: a series of changes in its political system and elite alliances, changes in mainstream cultural trends, and changes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in conflict. These changes jointly prompted the Turkish government to launch internal political mobilization, which further gave legitimacy to the Turkish intervention in the second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and facilitated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action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alyzing the processes of Turkey’s waiting in the wings before and after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can not only rationalize its “reckless” intervention, but also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the Turkish government in recent years.

[Keywords] Turkey, second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the situation in the Caucasus, window of opportunity,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regional security

[Authors] ZENG Xianghong,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WANG Haoyu, Student,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 81 **Climate Security and Hegemonic Maintenance: Global Promotion of the US Climate Security Strategy**

LI Xinlei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potential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was first captured by the US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then entered the US government's security agenda. Due to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s of Obama and Biden,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climate security strategy. With the increasing impact of climate geopolitics on the world landscape, the United States begins to regard global promotion of its climate security strategy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US military,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discourse hegemony in the global process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fully embedded the response to the climate crisis into the U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spared no efforts to promote its global climate security strategy in a variety of ways like creating consensus on the climate crisis among its allies, launching NATO's climate security framework, consolidating the US Army's climate resilience and promoting its military deployment in climate geography-sensitive areas across the globe, expanding the US-led green technology alliance and clean energy supply chain, enhancing its leadership of agenda setting and scientific discourse in global climate security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military cooperation on dealing with global climate risks, as well as promoting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standards in line with climate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rules under the Indo-Pacific framework. However, this expansion path featuring "national security first" in global climate security participation is difficult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and human security objectives and highlights the tension between US national climate security and global climate security. Coping with climate crisis calls for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as to promote a balanced, coordinated and inclusive new order of global climate secur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security" concept.

[Keywords] climate security,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hegemonic maintenance, climate geopolitics, global climate security governance

[Author] LI Xinlei,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 110 **Deb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onvergence, Divergence and the Underlying Logic**

BO Yan

[Abstract] Although the deb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have las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no universal resolu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has been reached so far.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tends to